

喀斯特高原山地区农民工回流与县域城镇化

——以贵州省织金县为例

周晓芳¹ 扶丁阳²¹

(1. 华南师范大学 旅游管理学院, 中国广东 广州 510630;

2. 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海事学院, 中国广东 广州 510800)

【摘要】: 选取城镇化速度较快、从国家级贫困县一跃而成黔中经济强县、具代表性的贵州省织金县为案例地, 基于人口和土地两个方面的 5 年间城镇化数据, 从村—镇—县三级地域研究回流农民工对喀斯特高原山地区县域城镇化过程的影响, 得到以下结论: ①回流农民工是县域城镇化的主体, 现阶段具有回城回镇难回村的特点, 且存在诸如“中青离家老后回”等第一代农民工群体性特征。②回流农民工对县域城镇化过程有积极的影响, 表现为县城大城区和乡镇小镇区的空间外溢效应以及不同乡镇的差异性空间效应, 充分反映贵州山地特色城镇化过程, 是喀斯特高原山地区县域回流农民工的就地就近城镇化。③行政驱动型、交通驱动型和产业驱动型是喀斯特高原山地区农民工回流与县域城镇化空间效应的三种外溢模式。

【关键词】: 县域城镇化 农民工回流 山区县 喀斯特 就近城镇化 乡村振兴

【中图分类号】: F249.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8462 (2020) 01-0085-08

郡县治, 天下安。县域在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处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 因此城镇化建设的重点和落脚点关键在县域, 县域城镇化在国家城镇化战略格局中占据重要地位。1998 年十五届三中全会提出“小城镇, 大战略”开始, 到 2000 年颁布《关于促进小城镇健康发展若干意见》, 再到 2005 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战略, 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成为中国城乡发展的“双轮驱动”^[1]; 接着 2014 年《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提出积极挖掘中小城市、县级区域的发展潜力, 2016 年《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若干意见》中提出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加快培育中小城市和特色小城镇、辐射带动新农村建设等要求, 2017 年特色小镇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 小城镇作为我国城镇化的载体构成、联系大中城市和乡村的纽带, 重要性日益凸显^[2]; “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后, 继续推动农村城镇化发展, 发展县域经济以实现农业转移人口的就近就地城镇化^[3]。可见, 县域承担起了城镇化和实现农村城市化、农业现代化的伟大使命^[4-5]。

农村劳动方向城镇大规模迁移是推动我国城镇化的主要动力, 城镇常住人口增量近 80%是迁移人口贡献的^[6-7], 尤其是西部地区, 主要依靠农民工流动数量和质量双重驱动^[8]。农民工与家乡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 大概 70%~90%的外出务工者会选择返回家乡定居^[9-11], 而人口回流又会加速县域城镇化进程^[12]。自由流动的农村劳动力是实现城镇持续发展的基础, 始终充当着城镇化的微观主体^[13], 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必将是中国城镇化发展的重要推力^[14]。从回流农民工的定居意愿来看: 农民工

作者简介: 周晓芳(1978-), 女, 贵州织金人, 博士, 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乡村振兴与旅游发展、中国传统地理文化。

E-mail: zhouxiaofang@m.scnu.edu.cn。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401189)。

回流后主要定居去向为县、镇^[15]，回流后回到农村的比例下降^[16]。从定居能力来看：回流农民工有一定的资本积累，承担得起家乡附近城镇的房价^[16]；回流农民工就业非农化显著，更容易在城镇找到工作^[17]；农民工具有较强的城市生活的经验^[18]，回流农工具备就近城镇化的比较优势^[19]，是城镇化的重要力量，以农民为主体的城镇化是破解二元体制的关键^[20]。实证研究表明回流农民工已成为回流县镇的永久迁移者，回流县镇农民工群体的市民化程度较高^[21]。可见，以农民为主体的城镇化是破解二元体制的关键^[21]，回流农民工是县域城镇化的重要力量。

全国有 2858 个县级行政区，占据我国 91.8% 的国土面积，分布着大部分人口。2010 年全国城镇化率突破 50%，而县级地区仅为 34.9%，只有 10% 的县级单元城镇化率超过 50%，县域城镇化潜力巨大^[22]。县域在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23]，是农村人口迁移的主要阵地，县域城镇化要求农民跨越的空间、经济和社会距离较短，农民的可接受性高^[24]。以往的研究较少关注返乡农民工对流出地县域城镇化的影响，更少关注回流农民工在县域内城镇化的选择差异。且有关城镇化的研究区域主要集中于珠三角、福建、浙江、苏南等地^[25-27]，山地区县域城镇化研究很有必要关注。贵州喀斯特分布占全省土地面积的 73%^[28]，高原山地是贵州宏观地域基本特征^[29]，占全省土地面积的 87%^[30]。《贵州省山地特色新型城镇化规划（2016—2020 年）》指出，推进山地特色新型城镇化是贵州发展的重要途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城镇化的基本原则，就地就近城镇化是积极引导方向。因此，研究以回流农民工为主体的贵州山地县域城镇化具有时代和地区意义。

1 农民工回流对县域城镇化的影响

本研究选取的织金县位于贵州省中西部黔西高原向黔中丘原盆地过渡地带，喀斯特地貌面积比例超过 90%。全县有坡地 1336.6km²，占总土地面积 46.6%，丘陵地 1430.2km²，占 49.9%，平地 101.2km²，占 3.5%。山地多、平地少，特殊喀斯特山区地貌空间构造及其生态环境脆弱性，影响着山地城镇化的空间模式。织金县辖 6 个街道办事处、16 个镇、10 个民族乡，共 334 个村、235 个居委会、8 个社区、2566 个村民小组。是贵阳“1 小时经济圈”和“黔中经济区”的重要组成部分。黔中城市群是贵州省城镇化的主体，织金作为人口大县和面积大县，是黔中城市群的重要组成，其城镇化过程对贵州省城镇化起着不容小觑的作用。2015—2020 年是贵州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关键时期，因此本文以 2015 年为研究重要时间节点。

织金县城镇化率增长很快，2004 以前小于 10%，2005 达到 14%，到 2010 年为 24.82% 并上升到 2016 年的 40.35%。但是，织金县的城镇化率一直远低于贵州省水平，说明织金县的城镇化水平总体较低，城镇化发展基础薄弱。根据诺瑟姆曲线判断，织金县城镇化率水平处于加速阶段，县省两者之间的差距在不断缩小，尤其在 2010 年以后这种现象更加明显。结合回流农民工统计数据进行分析，可发现两者高度一致。初步推测回流的农民工对县域城镇化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也说明选取数据时间段的合理性（图 1、图 2）。

从城镇化县域空间分布变化看（图 3），以县城为中心的中部区域城镇化很快，北部增长也异常迅速，县域城镇化过程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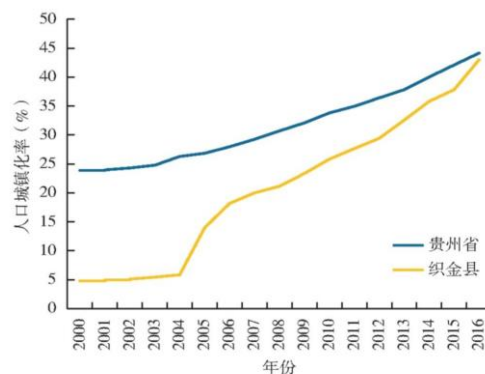


图 1 织金县和贵州省城镇化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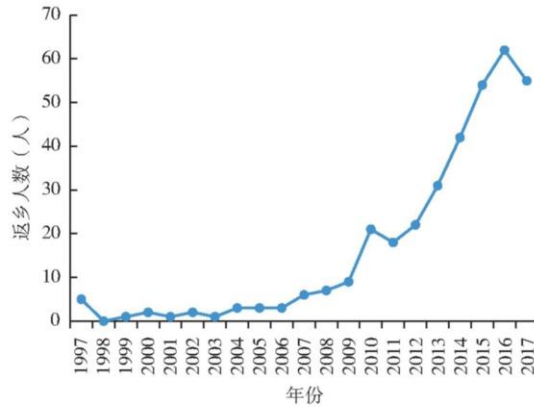


图 2 各年份回流农民工情况统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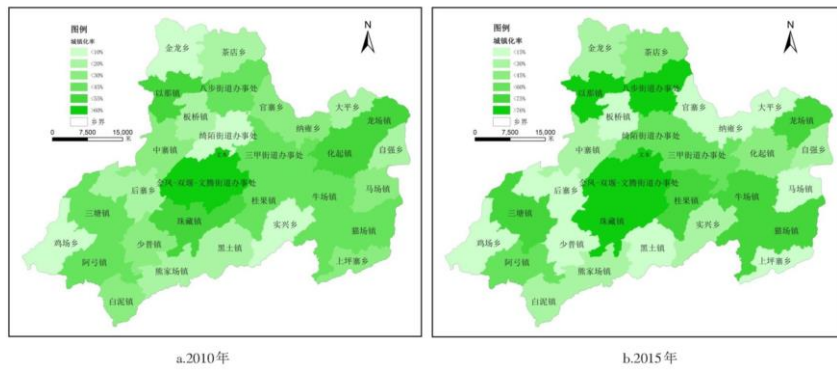


图 3 织金县分乡镇城镇化率

城镇化的直接结果就是大量的农业用地转变为建筑用地^[31]。其中居民点作为居民生产生活的场所和地域人地关系的核心，直接反映城镇化的变化^[32]。图 4 所示 2010—2015 年织金县居民点用地演变剧烈，从空间分布情况来看，县城城区是织金县居民点数量最多、密度最大的区域。乡镇居民点增加显著，有的用地增加幅度甚至大于县城。

为了更好地揭示这一变化，以景观格局指数的斑块面积分乡镇单元对比分析（图 5），进一步体现居民点扩张以县城为核心、乡镇分散化的特点，即城镇化的县城区化和乡镇地区小城镇化^[33]。

综上，农民工回流对县域城镇化如何产生影响且表现为怎样的空间过程，是本文要解决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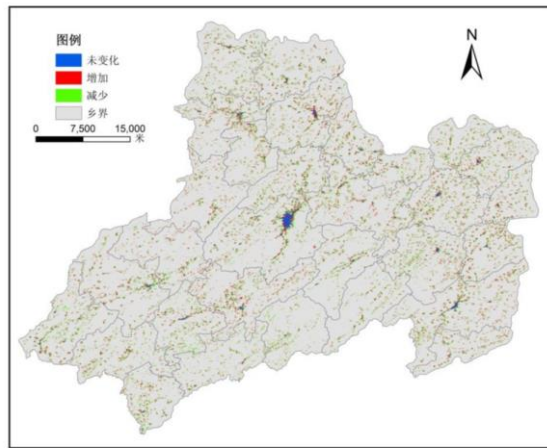


图 4 织金县 2010—2015 年居民点用地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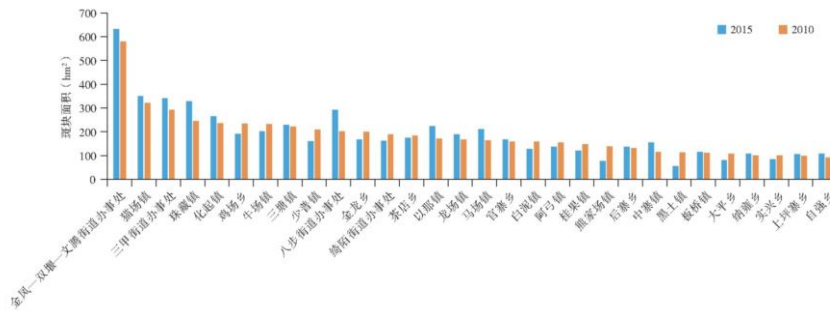


图 5 织金县各乡镇居民点斑块面积分布

2 研究方法和数据

对于农民工回流影响县域城镇化这一问题，我们采用 Probit 模型，主要是基于农民工回流行为和影响因素的数据是分类为主的离散数据，且因变量离散数值大于两类，而 Probit 是根据可观测的有序反应数据研究不可观测的潜变量变化规律，较为适合，公式为：

$$Y_i = \beta X_i + \alpha \quad (1)$$

式中： Y_i 为城镇化水平； X_i 为农民工回流数据，该数据包括性别、年龄、婚否、受教育程度、民族、文化程度、就业、收入等一系列解释变量； β 为待估计参数； α 为随机扰动项。

该部分数据来源于织金县统计局和劳动人社局，其中城镇化数据来自于统计局的分乡镇人口统计，农民工回流数据来自于劳动人社局和调研团队于 2017 年暑期在织金县域范围内按各乡镇经济发展水平及距离县城的地理位置，选取中心城区、7 个乡镇和 9 个村庄（包括新型农村社区）开展的问卷调查。调查针对回流农民工发放并回收有效问卷 368 份，样本在县、镇、村三个维度约各占 1/3，分布较均匀，覆盖不同性别、年龄、民族、教育水平，且在就业和收入水平上具有差异性，具有代表性。

城镇化是一个过程，且这个过程可由空间的变化来体现。上述方法还体现不出空间效应，需要进一步选取村—镇—县三级地域空间来细化。在农民工回流数量有限且不断变化的前提下，三类空间存在交互效应：不同空间被解释变量间的内生交互效应、某一空间独立的解释变量与另一空间被解释变量间的外生交互效应、不同区位误差项间的交互效应，特别前两项效应是空间外溢效应的主要来源^[34]。如果 LM 检验拒绝 OLS 模型，既存在空间滞后又存在空间误差时应选择空间杜宾模型（SDM）^[35]。公式为：

$$\ln UTN_{it} = \rho \sum_{j=1}^N W_{ij} \ln UTN_{jt} + \theta \ln RWM_{it} + \varnothing \sum_{j=1, j \neq i}^I W_{ij} \ln RWN_{jt} + \mu_i + v_t + \varepsilon_{it} \quad (2)$$

式中： $\ln UTN_{it}$ 为城镇化水平变量； $\ln RWM_{it}$ 为农民工回流变量； i 、 j 代表地区； t 代表年份； ρ 为空间回归系数，代表一个地区变量变化对相邻地区的溢出影响； W_{ij} 为空间权重矩阵； θ 为解释变量； \varnothing 为其空间滞后的系数，表示邻近地区的变量变化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 μ_i 为地区效应； v_t 为时间效应； ε_{it} 为随机扰动项。

该部分的城镇化数据是土地城镇化数据，使用 ArcGIS 提取 5 年间县域居民点（图 4）并叠加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含乡镇界限和行政村界限）进行统计。农民工回流数据来源于织金县劳动人社局，但收集到的资料只有乡镇一级，我们基于县域的乡镇行政区划，考虑通过此类空间外溢效应以体现地域空间的结构，但其中的误差交互效应需要考虑。

3 结果分析

3.1 回流农民工对县域城镇化的影响

资料显示，织金县 2015 年户籍人口为 119.75 万，2010—2015 年常住人口总是比户籍人口少 30 万人左右，说明人口流出比重较大，也即织金县人口城镇化的主要力量不是依靠外来人口，回流农民工是不可忽视的主体。通过公式 1 统计分析得到表 1。对农民工回流情况的描述性统计均值为 2.86，说明农民工回流对城镇化有积极的影响。其中回到县城、乡镇和农村的平均值分别为 2.55、2.98 和 1.02，说明农民工回流到乡镇对城镇化的影响较大，其次为回流到县城，最后是乡村，体现回城回镇难回村的县域城镇化特点。

表 1 县域农民工回流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变量定义	均值	最小值	最大值	标准差
回流地点	回县城=1；回乡镇=2；回农村=3	2.86	1	3	0.77
性别	男=1；女=2	1.58	1	2	0.48
年龄	15-30 岁=1；31-45=2；45-60 岁=3	2.43	1	3	0.65
民族	汉族=1；苗族=2；彝族=3；布依族=4；白族=5；其他=6	2.77	1	6	1.43
婚否	未婚=0；已婚=1	1.75	0	1	0.38
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1；初中=2；高中及中专=3；大专=4；本科及以上=5	1.39	1	5	1.03
外出务工地点	县 1 内=0；省外=1；省内县外=2；国外=3	1.66	0	3	0.67
回流前就业行业	建筑=1；制造加工=2；交通运输仓储=3；住宿餐饮=4；个体经营=5；其他=6；农业=7	6.23	1	7	2.20
回流后就业行业	建筑=1；制造加工=2；交通运输仓储=3；住宿餐饮=4；个体经营=5；其他	1.54	1	6	2.57

业	=6; 农业=7			
回流前收入/元 1000 以下=1; 1000-2000=2; 2001-3000=3; 3001-4000=4; 4001-5000=5; 1.76		1	6	1.92
6000 以上=6				
回流后收入/元 1000 以下=1; 1000-2000=2; 2001-3000=3; 3001-4000=4; 4001-5000=5; 2.45		1	6	1.76
6000 以上=6				

回流农民工的个体特征对其回流行为和意愿有影响，进而影响县域城镇化的进程。第一代农民工回流的较多，年轻代农民工还继续留在城市打拼，已婚农民工更愿回乡加入城镇化的过程，与年龄对应的文化程度也影响县域城镇化的进程。从表 1 中年齡、性别、民族、婚否、文化程度的各项统计指标看，目前对县域城镇化影响较大的回流农民具有大齡且已婚、文化程度不高的一代农民工的群体性特点。作为一个少数民族人口近一半的县，统计显示回流苗族和彝族农民工对县域城镇化有较大的影响，可能与调研区域少数民族人口聚集有关。在回流农民工的经济特征方面，收入有一定的影响但不明显，可能与收入数据的真实性有关。另外，虽然省外务工比重下降，省内比重增加，但外出务工的经历、从农民身份转变到工人身份等，都影响着城镇化过程。

3.2 回流农民工对县域城镇化的空间效应

要研究农民工回流下的县域城镇化的过程表现在空间上是相关的，且这种空间相关既要体现因变量的，也要体现自变量。首先使用方差分析两个变量的时空变化情况，分别选用总方差、组间方差和组内方差来体现相异个体之间、特定个体的变化，计算结果得到总方差与组间方差之差较小，反映农民工回流对县域城镇化有影响但作用有限，这可能与统计时间较短有关系，但组外方差大于组内方差，体现空间变异情况。再使用似然比 (LR) 进行检验，时间效应和空间效应均通过。进一步进行 Hausman 检验后判断可采用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进行分析，各项结果见表 2。

表 2 县域农民工回流对城镇化影响的效应估计

变量	固定效应	随机效应
lnUTN	0.0568 (1.9544)	0.0034 (0.08712)
lnRWN	0.0253** (1.3498)	-0.0325 (-1.5269)
W × lnUTN	0.1659*** (0.9544)	0.0034 (0.0452)
W × lnRWN	-0.1545 (-3.7692)	0.0795 (2.1429)
LR 检验	9.8746 (7.0004)	4.0784 (0.0751)
Hausman 检验	38.9278***	29.8756***

注：***、**分别表示在 1%、5%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 t 检验值。

可见农民工回流变量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影响着织金县城镇化的过程，这种影响不仅包括农民工回流造成居民点扩张的直接外溢效应，即反映某乡镇的农民工回流对乡镇城镇化的影响，并通过影响邻近地区城镇化空间过程进而对本地区的反馈效应。间接效应表示邻近地区农民工回流对本地区的城镇化的影响，以及因此而产生的对本地区的空间反馈效应。这两方面的效应还可进一步分解为各个时间段的时间效应，但由于本研究数据资料有限且时间跨度不长，我们忽视时间效应的分析。另外，限于篇幅，32 个街道和乡镇的数据不能详细展示，但可以初步看出，中部街道和东北部乡镇的农民工回流对城镇化增长有正效应，南部有负效应，其他地区效应不显著。

3.3 县域城镇化空间效应的三种外溢模式

县域城镇化在空间上表现为城镇区域居民点空间的外溢，其中县城城区城市建设用地扩张、城市景观化明显，就此总结县域城镇化空间效应的第一种外溢模式为行政驱动型，其城区范围扩大得力于行政区划上的变更，以及相应的城市建设进程。2010年织金县城区的范围仅包括城关镇，城区人口6.9万人，2013年城关镇改为金凤—双堰—文腾街道办事处，绮陌乡、八步镇、三甲乡设置为街道办事处（黔府函[2013]104号），使得2015年织金县城区范围显著扩大，城区人口达到12.5万人，比2010年多5.6万人。如图6并结合图4所示，县城范围扩大，居民点增加迅速，主要沿省道209向北和东部扩展。这一方面体现了交通的重要作用，一方面也和北部和东部地势较低有关。可见，喀斯特山地区地形影响织金县城化的延伸，交通基础设施是城化的扩张方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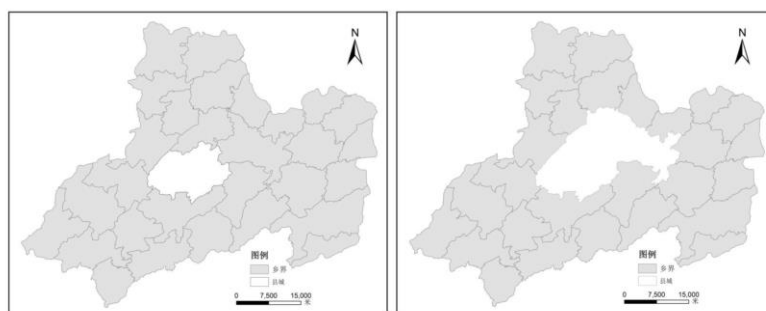


图6 织金县县城范围（左2010年，右2015年）

类似的行政驱动型模式还表现在撤乡并镇直接导致镇区范围扩大，催生一批经济强镇。例如位于东南部的营和乡于2013年正式批准并入猫场镇，人口由2010年的7293人变为2015年的28761人，用地增加如图7所示。人口和用地的增加为城镇化的发展提供了基本的前提，2015年猫场镇的城镇化率为59%，在织金县乡镇排名靠前。

第二种为交通驱动模式，即乡镇区居民点围绕乡镇府驻地附近，明显沿交通干线和街道扩展。以茶店乡为例，2010年左右镇区居民点主要分布在省道209沿线，2015年明显的向东、南、西三个方向扩张。南部扩张主要是由于移民街的建设（2013年），东部沿旧街以及沿新街（2013年）扩张，是整个镇区居民点最密集的地带，西部沿省道延伸方向扩张（图8）。

第三种为产业拉动模式，例如珠藏镇位于织金县城南部，凭借煤炭资源优势，2010—2015年城镇化率由21%增长到68%。人口由6395人增长到27593人，但是镇区居民点在研究时期内空间扩张情况并不特别显著，一方面是受到地形因子的制约，另一方面实地调研中也发现沿高层建筑较其他乡镇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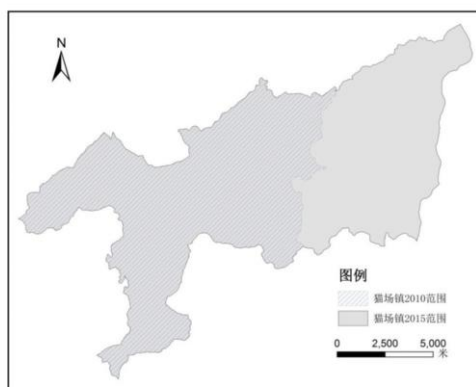


图 7 猫场镇镇区变化

4 结论

目前关于城镇化的研究有省^[36]、市^[37]、县^[14]尺度，其中县域是城镇化的关键，本研究立足于贵州喀斯特高原山地区及其特色山地城镇化道路的实际，选取典型案例地织金县为研究对象，将农民工回流和县域城镇化联系起来，分析得到织金县城镇化过程不是依靠外来人口，回流农民工是城镇化的主体。并从村—镇—城这三级地域回流农民工的迁移目标路径形成的空间效应来研究喀斯特高原山地县域城镇化过程，得到以下结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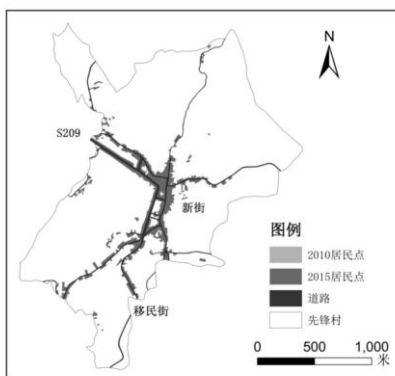


图 8 茶店乡镇区居民点与道路分布

(1) 现阶段回流农民工是县域城镇化的主体，具有回城回镇难回村的特点，且存在诸如“中青离家老后回”等第一代农民工群体性特征。

(2) 回流农民工对县域城镇化过程有积极的影响，表现为县城主城区和乡镇小镇区的空间外溢效应以及不同乡镇的差异性空间效应，充分反映贵州山地特色城镇化过程，即喀斯特高原山地区县域回流农民工的就地就近城镇化。

(3) 行政驱动型、交通驱动型和产业驱动型是农民工回流与县域城镇化空间效应的三种外溢模式。

调研中发现，织金县城镇化的过程最为明显的是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从村级尺度看，乡村外出务工人员最多（占调研数据的 95%），回流到乡村定居的却很少（15%），乡村人口城镇化过程加快。乡村人口城镇化最先体现为农村精英的城镇化，这决定了城镇化的进程也是农村人、财、物流出农村的过程^[38]，是乡村消亡的过程。但从乡村的发展来看，服务于城市市场的农业生产、城市的非农经济向乡村扩展、文化观念和生活方式向乡村渗透等^[39-41]，是农村的就地城镇化范畴，这种就地是农业向上延伸价值链，农村基本建设现代化和农民生产生活方式转变等在原驻地发生的过程^[42]。从这个方面来看，县域的县城和乡镇对部分就近乡村发展有拉力的作用，是直接变就近乡村为城镇的过程。

而另一方面，外出务工人员回乡建房，使得乡村居民点并没有减少，乡村建筑景观更加多样丰富。同时，新土地政策使得返乡者依托土地流转或生产力提高可获得和在外打工等量齐观的收入。再加上农村二孩乃至多孩比例相对其他地区更高，且生育年龄普遍偏早，使得农村的下一代无论是数量还是迭代速度都高于城镇。并且，随着“后乡村”时代的到来，第二住房拥有者、游客、管理者以及其他新迁入者使得乡村人口结构不断丰富，乡村不再是僵化的地理实体和城市的附庸，而是通过持续不断的建构和重构得以复兴的空间^[57-58]。特别自“十九大”后乡村振兴成为国家重要战略，乡村的发展逐步转好，前景乐观。因此，构筑县域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双轮驱动力量，实现村—镇—城三级地域协调发展才是县域发展本质和未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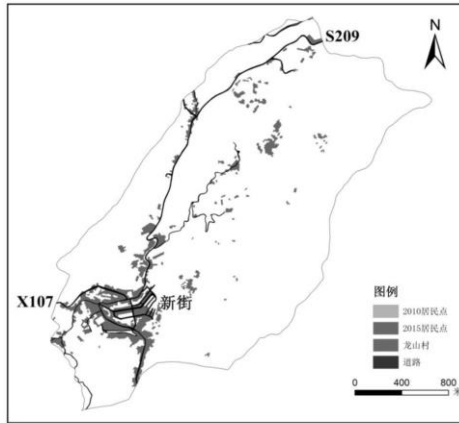


图9 珠藏镇镇区居民与道路分布

参考文献:

- [1]李铁. 新型城镇化路径选择[M]. 北京: 中国发展出版社, 2016.
- [2]陈侃侃, 朱烈建. 新型城镇化视角下的浙江省小城镇转型发展路径研究[J]. 小城镇建设, 2016(2):28-31.
- [3]李强, 陈振华, 张莹. 就近城镇化模式研究[J]. 广东社会科学, 2017(4):179-190.
- [4]费孝通. 小城镇大问题[J]. 江海学刊, 1984(1):6-26.
- [5]周干峙. 促使小城市在城镇化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J]. 城市规划, 1988(4):3-5.
- [6]Zhang Honglin, Song Shunfeng. Rural-urban migration and urbanization in China[C]//The Great Urbanization of China, 2014:279-300.
- [7]范剑勇, 王立军, 沈林洁. 产业集聚与农村劳动力的跨区域流动[J]. 管理世界, 2004(4):22-29.
- [8]王琴梅, 张佩佩. 农民工迁移对新型城镇化的驱动效应及区域差异研究[J]. 西北人口, 2015(6):43-49.
- [9]朱宇. 户籍制度改革与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居留意愿及其制约机制[J]. 南方人口, 2004, 19(3):21-28.
- [10]李若建. 广东省外来人口的定居性与流动性初步分析[J]. 人口研究, 2007, 31(6):45-54.
- [11]任远. “逐步沉淀”与“居留决定居留”——上海市外来人口居留模式分析[J]. 中国人口科学, 2006(3):67-72.
- [12]潘鑫, 魏旭红, 王颖, 等. 中部地区县域城镇化统计口径优化思考——半城镇化现象的视角[J]. 城市规划, 2015, 341(11):48-54.
- [13]卫龙宝, 胡慧洪, 钱文荣, 等. 城镇化过程中相关行为主体迁移意愿的分析——对浙江省海宁市农村居民的调查[J]. 中国

社会科学, 2003(5):39-48.

[14]殷江滨, 李郁. 产业转移背景下县域城镇化发展—基于地方政府行为的视角[J]. 经济地理, 2012, 32(8):71-77.

[15]周建华, 周倩. 高房价背景下农民工留城定居意愿及其政策含义[J]. 经济体制改革, 2014(1):77-81.

[16]张甜, 朱宇, 林李月, 等. 就地城镇化背景下回流农民工居住区位选择—以河南省永城市为例[J]. 经济地理, 2017, 37(4):84-91.

[17]Zhao Yaohui.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return migration:Recent evidence from China[J].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002, 30(2):376-394.

[18]白南生, 何宇鹏. 回乡, 还是外出? —安徽四川二省农村外出劳动力回流研究[J]. 社会学研究, 2002(3):64-78.

[19]门丹, 齐小兵. 回流农民工就近城镇化: 比较优势与现实意义[J]. 经济学家, 2017(9):81-88.

[20]戚迪明, 张广胜, 杨肖丽, 等. 农民工“回流式”市民化: 现实考量与政策选择[J]. 农村经济, 2014(10):8-11.

[21]周柏春, 娄淑华. 新型城镇化的主体维度分析: 来自于政府与农民的考察[J]. 农业经济问题, 2015(4):71-77.

[22]黄金川, 刘倩倩, 陈明. 基于 GIS 的中国城市群发育格局识别研究[J]. 城市规划学刊, 2014, 35(3):37-44.

[23]王智勇. 西部地区县域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基于云南省 2005-2012 年面板数据的研究[J]. 金融评论, 2016(4):64-78.

[24]孙久文, 周玉龙. 城乡差距、劳动力迁移与城镇化—基于县域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J]. 经济评论, 2015(2):29-40.

[25]祁新华, 朱宇, 周燕萍. 乡村劳动力迁移的“双拉力”模型及其就地城镇化效应—基于中国东南沿海三个地区的实证研究[J]. 地理科学, 2012(1):25-30.

[26]崔功豪, 马润潮. 中国自下而上城市化的发展及其机制[J]. 地理学报, 1999(2):106-115.

[27]崔曙平, 赵青宇. 苏南就地城镇化模式的启示与思考. 城市发展研究, 2013, 20(10):47-51.

[28]何才华. 贵州岩溶环境保护与持续发展[J].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01, 19(3):1-7.

[29]高贵龙, 邓自民, 熊康宁. 喀斯特的呼唤与希望[M]. 贵阳: 贵州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3.

[30]熊康宁, 杜芳娟, 廖婧琳, 等. 喀斯特文化与建筑生态艺术[M].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4.

[31]贺雪峰. 新乡土中国[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32]金其铭. 我国农村聚落地理研究历史及现今趋向[J]. 地理学报, 1988(4):311-317.

-
- [33]沈茂英. 少数民族地区城镇化问题研究—以四川藏区为例[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科版, 2010, 31(10):136-140.
- [34]Vega, Solmaria, Elhorst J P. The SLX Model[J].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 2015, 55(3):339-363.
- [35]Elhorst J P. Applied spatial econometrics:Raising the bar[J]. Spatial Economic Analysis, 2010, 5(1):9-28.
- [36]刘涛, 齐元静, 曹广忠. 中国流动人口空间格局演变机制及城镇化效应—基于 2000 和 2010 年人口普查分县数据的分析[J]. 地理学报, 2015, 90(1):120-120.
- [37]Liu Yungang, Yan Tingting. Types of the return migrations from mega-cities to local cities in China:A case study of Zhumadian's return migrants[J].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3, 33(10):1 245-1 251.
- [38]贺雪峰, 袁松, 宋丽娜. 农民工返乡研究: 以 2008 年金融危机对农民工返乡的影响为例[M].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10.
- [39]Clope P, Davies L. Deprivation and lifestyles in rural Wales. -I. Towards a cultural dimension[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1992, 8(4):349-358.
- [40]Thrift N. Manufacturing rural geography?[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1987, 3(1):77-81.
- [41]Winstanley M J. The new culture of the countryside[J]. Public Choice, 1989, 77(1):145-50.
- [42]王建康, 谷国锋, 姚丽, 等. 中国新型城镇化的空间格局演变及影响因素分析[J]. 地理科学, 2016, 36(1):63-71.
- [43]Bryden J. Prospects for rural areas in an enlarged Europe[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1995, 10(4):387-394.
- [44]吕祖宜, 林耿. 混杂性: 关于乡村性的再认识[J]. 地理研究, 2017(10):1 873-1 885.